

身大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非政治世界（根据地）的情况下，为保卫生活而走向政治世界，而毛泽东正是依靠这些常民来建设国家的。竹内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幻想”正源于这一认识。

但问题在于，如同政治之于常民通常表现的那样，基于重建村落共同体这一根据地建设运动的“军事政治”，也正是“来自对方的政治”。具体说来，赛尔登所描述的30年代末到40年代前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并不是自己主动地要求，而是被迫参加抗战这种军事政治的，也即当日本的侵略造成了对村落生活的威胁，他们不得不起而抗争。因此，他们在抗战的“政治”中也并没有离开作为生业之所的村落。如果说他们对于“政治”的忠诚确实起作用，那么这种忠诚并不是对国家的忠诚，而是对于自己所属村落的忠诚。

但是，在毛泽东的新中国诞生之后，要求农民大众参加的政治是否也属于“来自对方的政治”呢？比如，1953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确可以看作“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的延续，但却并不是在村落日常生活遭遇外部威胁而发自村庄内部的“抵抗”。因此，与陕甘宁边区时代的村落重建运动不同，农业合作化超越了自然村的范围，带有向国家层面扩大“升华”的可能性。从1953年的初级社到后来的高级社，在短短的5年间，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在1958年远远超过自然村（二三百人）的范围而扩大到数万人规模的人民公社。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国家所要求于农民大众的，并不是对其所属村庄的忠诚，而是对于国家的忠诚。而农民事实上也积极响应了这种要求。

问题在于，为什么生活于等身大的非政治世界的中国农民会如此轻易地被纳入国家政治？竹内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考察。甚至可以说，他可能不愿意相信中国农民发生了这种变化。菅孝行所说的他对于毛泽东的“幻想”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因素。但谨慎说来，也许正是竹内好对于战后日本的强烈批判意识，导致了他对看上去与日本正相反的新中国和毛泽东抱有过大的期望，对此不应该加以忽视。

那么，生活于等身大的非政治世界的常民，超越抵抗的“政治”层面，为什么不是与国家相对抗，而是“升华”到了支持国家的政治世界了呢？这一点密切涉及下一节将要论述的竹内好仿效鲁迅而不断强调的一系列问题，也即“挣扎”、“在抵抗失败的同时抵抗对于失败的忘却”，以至通过此等方式的“觉悟到了失败的持续抵抗”。²⁵

关于“觉悟到了失败的持续抵抗”（下文简称“挣扎”）这一论点，孙歌在研讨会上强调它是重新评价竹内好时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认为，孙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认识到了这样一种状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时代固然如此，直到改革开放实施后的今天的中国，尽管“挣扎”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而是在增大，但是却被遗忘了。²⁶

但无论怎样，如果竹内好能够将其有关“持续抵抗”的基本观点同样用来观察和思考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肯定就不会对毛泽东抱有那么强烈的幻想。关于他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将在下一节进行探讨。

[V]

东方主义与“内生性发展”： 关于失败的自觉问题

在18世纪迄今的所谓“近现代”历史中，将常民的等身大的生活加以破坏的，并由此招致常民抵抗的外部横压过来的“政治世界”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源于“欧美的现代”所特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的军事政治力量。

在中国革命中，破坏农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是以日本为首的列强侵略和半殖民地统治压力，也即欧美的现代基于“自我扩张”的军事行动。进而，通过排放有毒废水而将水俣居民的日常生活加以破坏的新日本氮肥公司，也自然是遵循欧美式的现代化逻辑登场的“日本的现代”自我扩张的产物。同样的例子也见于东京的三里冢，为了建设成田国际

机场，三里冢农民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土地被强制征用，他们的日常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而破坏者“空港公团”也正是在6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中无限扩张的“日本的现代”的产物。

通常所说的“西方的冲击”(Western impact)是欧美的现代基于自我扩张和自我实现而施加于“亚细亚”的，同时也正是“亚细亚”与“欧罗巴”的相遇产生了亚细亚的抵抗和抗战。但正如前文所看到的那样，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西方的冲击”这一构图，并非只是出现于单纯地区概念上的“亚洲”，也出现在欧洲世界内部，例如日本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发生在水俣和三里冢的抗争是日本“内部的亚洲”的抵抗。

竹内好指出，由于西方的冲击，“亚细亚”被迫开启了近代的帷幕。1970年代后期开始，基于上述东西方关系构图的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受到了萨伊德和柯文等人的批判，被指斥为“东方主义”。但萨伊德等人的批判是否也适用于竹内好呢？实际上，竹内的观点中明显包含着对“东方主义”批判，并且具有超越这种批判的内容。

在讨论会上，沟口雄三基于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提出了包括对竹内进行批判的新的历史解释。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所谓“东方主义”构图是在世界历史上处于同一时代的东西方相遇之后，也即在空间轴（沟口称为“横线”）上产生的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压力。这种压力对于“东方”来说带有强迫性，因此后者的被动性非常明显。而正是这种被动性导致东方失去了历史的主体性，成为其主动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主义”的重要原因。

但沟口指出，东方的“现代化”并不只是由东西关系上的横向压力造成的。也就是说，必须重视东方内部时间轴（竹内称为“纵线”）上的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力量。他具体提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例子，认为参加革命的各省、各地区的“新军”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至少是受到省级区域以下的地方乡村社会内生的“现代化”所支持的。也就是说，“新军”的革命同时也是地方社会内生的社会革命。

但问题在于，这种内生的现代化是否是以常民的等身大的世界为基础，也即在不抛弃受到生命循环周期制约的农林渔业（第一产业）的情况下展开的“现代化”？换句话说，不论现代化如何内生，其内容都有可能是以欧美式的现代化模式为目标的。对此，沟口认为，只要纵向的内生性力量较为强大，即便在内容上接近欧美模式，也同样可以克服“东方主义”的被动性。这好像有些过于乐观。

基于上述分析，沟口主张，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轴中，必须更加重视从纵向上来考察历史。他进而强调，在看待东方内生的现代化因素时，应将分析视角放到地方社会而不是国家层面。这与1970年代由鹤见和子及市井三郎等人发起的“思想的冒险小组”提出、后由鹤见本人和玉野井芳郎、川田侃等人冠名的“内生性发展模式”及“地域主义”观点²⁷基本相同。但问题是，纵向的“内生型现代化”真地能够承受欧美的“外压式现代化”的压力，而最终成功实现东方的内生型现代化吗？借用沟口的表述方式，也就是纵线能否凌驾于横线而取得对于“东方主义”压力的胜利。

反过来看，竹内好本人也并没有否定东方存在着走向内生型现代化的努力。竹内与沟口的区别在于，他认为，东方的内生型现代化常常是为了抵抗来自欧美的外压型现代化的压力而展开的，而且这种抵抗并不能带来沟口所预期的胜利，反而不得不在现实中经常遭遇“失败”。

竹内所说的外部强压下的“失败”并不是军事政治意义上的失败。正如从军事政治方面所看到的那样，东方的内生性发展模式曾经也取得了胜利。“失败”的真正含义在于，作为“社会发展模式”逐渐被欧美现代化模式所侵蚀和压倒，同时在心理层面上也被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主义”所侵蚀。²⁸当然，包括欧美现代化模式在内，任何社会发展模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但问题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变化依然表现为欧美现代化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东方依然处于欧美控制的巨大影响力和“东方主义”的强大心理压力之下，这才是竹内好所说的“失败”。

与此相对，沟口强调，发自东方纵轴上的内生性的现代化，并不是对于横压过来的“东方主义”性质的外压型现代化的抵抗，而是在并未意识到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以独特的形式出现的。这也正是内生性发展依靠其不受外来“东方主义”束缚的主体性取得成功的原因。但是，以这种“主体性”真地能挣脱“东方主义”的束缚而实现纵向的内生性发展吗？为了探讨这一点，下面将视野重新转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VI]

时间困境

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政策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在农业技术领域，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要依赖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之类的现代机械，而是要将双铧犁代表的中国传统农具改造成新的大型农机具，也就是不依靠作为“洋法”的西方技术，而是实行以“土法”为主的“土洋结合”。第二，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乡一级的人民公社层次也强调通过“自力更生”来实现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大幅度削减此前对地方的财政补助，同时也免去地方上交中央的大部分资金，作为地方政府的人民公社被赋予了财政自主权。这也就意味着将原来采取的苏联社会主义中央集权模式改变为财政领域的地方分权模式，²⁹但同时强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央集权。第三，在经济上确立了用10年时间赶上英国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第三点表明，“三面红旗”并不止于对欧美现代化的单纯抵抗，而是以取得对欧美式现代化的胜利为最终目的。

进入6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之后，中国脱离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追求非欧美模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并获得了国内外的较高评价。借用沟口雄三的说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内生型现代化”。但是，由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与欧美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抗的强烈意识，用竹

内好的话来说，依然没有能够从心理上摆脱欧美的束缚。这也正是“三面红旗”政策最终破产的原因。

人民公社建立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基础之上，在当时的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样，农业具有深受生命循环周期限制的时间制约性，因此，提出用10年时间赶超英国的发展目标，意味着在农业领域也必须克服这种时间制约，实现时间的加速化。也就是说，由于构成欧美现代化物质层面的“国民经济”的形成及其加速发展，通常只有在工业革命促使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转型的前提才有可能，因此人民公社也必须实现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进一步说，它以社会生产摆脱农业生命循环周期的制约而实现时间的加速化为前提条件。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压力，竹内才凭直觉认为东方对西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未实现上述产业结构转变的情况下试图超越农业本身具有的时间制约性，就意味着“三面红旗”的高速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即便能够将双铧犁之类的“土法”农业技术提升为大型农机具，目标总体的失败也难以避免。这几乎与把“十月怀胎”的时间和四到五年的育儿周期大幅度缩短一样不可能。实际上，“三面红旗”在1959—1961年间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的事件，的确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政策失败。

那么，导致“三面红旗”政策最终失败的时间加速化的要求，以及对于欧美现代化的“胜利”的确信，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1950年代的中国呢？其根源何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胜利信心的最初由来。

对“胜利”的确信明显来自对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记忆，特别是关于1942—1943年间陕甘宁边区展开的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的记忆。但回顾上述运动的过程可以发现，那场运动并没有试图超越农业具有的时间制约性，其目标是抵抗威胁农民日常生活的外来势力，是为了保卫日常生活。进一步说，赢得深受生命循环周